

回族历史

## 从“都人南迁”到“出于回部”： 明清山东青州回回历史记忆的变迁

丁慧倩

(中央民族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北京 100081)

**摘要:**本文以明清山东青州回回历史记忆的变迁为个案, 讨论了其祖先移民历史记忆从明代“都人南迁”的故事到清代强调祖先“出于回部”的变化。笔者认为, 明代“都人南迁”的表述更为靠近元明鼎革之际回回人的真实生活境遇, 而“出于回部”的表述则受到清朝平定天山南北历史事件的影响。“出于回部”的表述说明青州汉人和回回人对回、汉族属的识别在清中后期日益明显。

**关键词:**回回人; 回部; 历史记忆; 族群

中图分类号: K281. “2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0586(2011)02-0054-09

近年来, 关于历史记忆与族群之间关系的研究逐渐纳入到历史学者的研究视野中。王明珂对华夏边缘的研究说明历史记忆与族群的形成、变迁以及认同的观念都存在密切的联系, 一个族群需要共同的历史记忆来凝聚并与其他者区分<sup>[1]</sup>。赵世瑜《祖先记忆、家园象征与族群历史——山西洪洞大槐树传说解析》<sup>[2]</sup>一文通过对洪洞大槐树迁民传说故事的研究, 发现了在金元北方民族大融合以后的明清汉族族群意识重塑时期和清末民初民族主义意识构造时期的两条族群认同轨迹。这两个时期存在着族群关系紧张的情况和加强族群认同的需求, 因而洪洞大槐树迁民传说的产生和变化向我们传递了很多族群关系变动的历史信息。作者还进一步指出“人们对于自身历史的记忆不仅是一种社会的建构, 而且是出于他们面临具体的生活境遇时的需求。当这种历史记忆成为一种社会记忆的时候, 他们必须为此

创造出可以共享的资源, 获得形成社会记忆的契机”<sup>[2](P124)</sup>。已有的研究成果对笔者的研究颇有启发和指导意义。笔者认为, 由于历史记忆具有集体性, 它与族群这样的人群体保持着天然的联系。对历史记忆形成和变迁的研究, 将有助于我们探析一个族群的历史发展过程、生存环境的变化, 以及造成其结群、形成区别与认同观念的各种事件和因素, 最终在历时性的层面上理解族群的前世今生。

本文的研究以明清山东青州地区<sup>①</sup>回回人祖先历史记忆为对象。在本文展开论述之前, 笔者已对青州地区两个历史悠久、规模较大且文献资料丰富的回回家族做了个案性的剖析和对比研究, 其中大量涉及这两个家族历史记忆和历史表述的内容<sup>[3]</sup>。本文的研究将扩展研究对象的范围, 使用历史人类学的方法, 关注一个特定的群体——青州回回人——的历史记忆及其变迁、造成变迁的原因以及

收稿日期: 2011-01-17

作者简介: 丁慧倩(1978—), 女(回族), 天津人,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 博士, 主要从事明清社会史、回族史研究。



这种变迁与族群发展之间的关系。本文的研究将不重点分析人们记忆的事件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客观”性,而是关注造成人们如此记忆、表述自己历史的动因及其结果。

### “都人南迁”:明代青州回回人

明代青州回回人家族对祖先移民的历史记忆有很强的一致性,这与他们在元明两代的共同经历有关。

杨氏在青州是历史悠久的回回家族,其祖先杨应奎在明正德六年(1511年)考中进士,开启了这个家族在明清两代读书仕进的发展道路。杨应奎在嘉靖十九年(1540年)被免职归乡,此后开始编修家谱,由此为我们留下了关于这个家族最早的历史记述。

至宋宁宗开禧二年丙寅,元太祖即位于兀难河之源,遂征西域,兵至印度。赛典赤赡思丁,别庵伯尔<sup>②</sup>之裔也。率千骑以文豹白鹞迎降,命入宿卫,从征伐,以赛典赤呼之而不名。赛典赤华言贵族也。累官太师、上柱国、咸阳王。子五人,长纳速刺丁,亦至中书左丞相,延安王。子十三人,长伯颜察儿,官至中书平章政事,佩金符,尚[公]主,赠太师、奉元王。终元世,子孙贵显繁衍者皆赛典赤之裔也。世代邈远,不知其几何。传至吾(指杨应奎——笔者注)五世祖莫苏,居大都羊市角头,因以杨为氏。大都即今京师也。七世祖失其名讳,官益都路总管,及六世祖为临朐中尉者,遗有田宅于青。至大明洪武元年,兵取大都,大将军令都人南迁,六世祖遂携苏及二女奔青州,占籍古城,社民声迹,不敢显言仕宦宗族,故其详不可知<sup>③</sup>。

透过杨应奎的记述,我们对杨氏家族的起源和迁移过程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杨氏自称是赛典赤·赡思丁的后裔,赛典赤因成吉思汗西征而东迁进入元帝国,此后累世居官直至元末。这个赛典赤的后裔分支在元朝即已改汉姓为“杨”。他们与青州的联系也发生在元朝。杨应奎的七世祖和六世祖均在青州一带任职,因而在青州留有田宅。杨氏的祖先从元大都迁居青州的过程发生在元明鼎革之际,迁移的背景和原因则是徐达等人攻克大都之后“令都人南迁”,于是杨氏祖先迁居已有房屋、地产的青州,定居下来。

明代赵氏家族对其祖先来历和迁居青州历史的描述相对简单。据万历五年(1577年)的《赵氏先莹碑记》记载:

始祖伯颜口西域人也。仕元,赐姓赵,出将入相五十余年,忠绩班班,可口臣,实录载口。迨其子明远,始奉我朝,命徙青,为编户<sup>④</sup>。

此后赵氏的其他家族文献均称其始祖为伯颜,他在元朝即为官员,并改汉姓为赵。伯颜及其后裔在元朝的居住地不甚明了,既然在朝“出将入相”,居于大都的可能性比较大。赵氏定居青州始于明朝,始迁祖为赵明远。到了清代,赵氏在明初迁居青州的过程在家族文献中展现得更为丰满:

明太祖混一中夏,时换朝移,本枝散乱,或还西域,或徙北平,或迁河右。明高、明方<sup>⑤</sup>相继死节,惟明远蒙明太祖深嘉其讳,敕谕同始祖母封一品夫人马氏,改迁山东青州府益都县南柳社下户为民,其余勋臣子弟保全忠孝者,俱发南北为民。洪武元年八月二十三日出京,至丙寅初六日,入青州府益都县南柳社下户为民<sup>⑥</sup>。

迨及洪武,敕封伯颜忠武王,庙享百世。嘉其子明远讳,赐原旧职,受禄座勋府。而明远守节不仕,又诰封祖母马氏一品,命同子明远徙益都南柳社为编户,而我赵氏寄居青郡,又自此始<sup>⑦</sup>。

吾族入青郡,四百余年矣。……自元太祖征西,我咸阳王从与俱北,传三世而淮王,为元统一宇内,遂迁家都下。及洪武鼎迁,合门率死王事,惟禄座勋府公,系淮王第三子,留身奉母,潜伏不仕,明太祖强犯之,而公守节甚坚,遂谕行居兹土,为编户<sup>⑧</sup>。

从记载上看,赵氏和杨氏的祖先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他们在元代都有显赫的身份,并在元明王朝更替之时受外力的影响而迁居青州。虽然都是元代遗民,杨氏祖先在国破家亡后出于无奈而隐居青州,而赵氏祖先则“蒙明太祖深嘉其讳,敕谕同始祖母封一品夫人马氏,改迁山东青州府益都县南柳社下户为民”,迁移的过程带有某种恩遇的味道。

由于赵氏家族遗留的明代文献较为简单,我们仅能从万历五年(1577年)的《赵氏先莹碑》上得知其始祖的名字伯颜,其他情况不甚了了。《元史》的记载中有多位伯颜均能称得上“出将入相”,其中包括蒙古八邻部伯颜和赛典赤的后裔伯颜。而赵氏家族在清代文献则清楚地说明其始祖“伯颜”正是赛典赤伯颜。

赵氏在明代是否就认为他们的祖先是赛典赤的后裔呢?赵氏自己的文献资料没有提供任何依据,但在杨氏家族的资料中却透露出端倪。根据道光年间《益都杨氏世谱》的记载,九世有杨瑋者在修谱时将赵氏家谱世系的“前一图”编入杨氏家谱中:



青州赵氏相传以为与杨氏同出自赛典赤,其族人撰谱者遂以元世祖朝平宋之伯颜为赛典赤孙,云即赵氏始祖。符见不察颠末,误取其前一图编入谱内<sup>⑨</sup>。

“符见”是杨珣的字,他大约生活在明清之际。杨珣之所以能将赵氏家族的一部分世系挪移到本族世系中以达到连宗的目的,说明杨、赵两氏有共同的始祖,使连宗的活动有一个世系上的基础。因此,我们可以猜测赵氏家族至迟在明后期就已将自己的始祖伯颜认定为赛典赤的后裔了<sup>⑩</sup>。

杨、赵这两个自称是赛典赤后裔的家族在明朝初年迁居青州,尽管他们迁居青州的姿态略有不同,一个被迫,一个恩荣,但明代杨、赵两氏的祖先移民故事都叙述了一个元代显赫家族在元明鼎革之际“都人南迁”的历史过程。与元代遗民身份相关联,杨、赵两氏也都能追溯出自己祖先的域外身份以及在元代拥有的社会地位。此外,两个家族资料的记载还说明这种迁移不是偶发的行为,带有群体性。杨应奎的记载中称“至大明洪武元年,兵取大都,大将军令都人南迁”<sup>⑪</sup>;赵氏家谱则说“其余勋臣子弟保全忠孝者,俱发南北为民”<sup>⑫</sup>。于是“都人南迁”的移民历史就不仅存在于杨、赵两个家族之中,极有可能是本地回回人在明代集体性的历史记忆。

#### “出于回部”:清代青州回回人

从清代开始,青州回回人祖先移民故事逐渐从“都人南迁”的历史记忆转向强调对远祖身份的追述。

青州乾隆年间回回举人杨峒在为当地回回刘姓撰写的谱序中说:“吾青州之族出于回部者,皆自燕赵南徙”<sup>⑬</sup>。杨峒的这句话透露出两个信息:一是青州回回家族中有一些应该“出于回部”;二是这些“出于回部”的回回家族来自“燕赵”之地。杨峒所说的“回部”在青州的历史背景下可以理解为元代、甚至是元代以前中亚和西亚信仰伊斯兰教的地区、国家或政权,而“燕赵南徙”则是指从元大都所处的燕赵之地迁移到青州,其时间应该是明朝初年。

杨峒的这句话叙述了清代青州地区回回家族祖先移民历史记忆的内容,概括地说就是:青州一些回回家族的祖先是元代或更早时代中亚、西亚信仰伊斯兰教的人,他们在元代拥有显赫的身世和较高的社会地位,元明鼎革之际,他们以元代遗民的身份,从元大都及附近地区南迁至青州,形成后来的青州回回家族。

杨、赵两氏家族在明代即同以赛典赤后裔自居,赵氏在清代更将赛典赤“圣裔”<sup>⑭</sup>的身份发挥,把自己的祖先直接追溯到了穆罕默德。在青州除了赵氏之外,还有丁氏也出自穆罕默德。《益都丁氏族谱》称:“常考丁氏为至圣穆罕默德之甥赛义德后也,至圣以赛、沙、丁三姓为后,故丁氏系出回部。”<sup>⑮</sup>此外,像杨氏这样以赛典赤·赡思丁为始祖的家族,其与穆罕默德之间也存在联系,只是杨氏家族并未强调这种联系。

除上述以穆罕默德、赛典赤·赡思丁为祖先的各姓氏外,青州其他回回家族的祖先也可追述到元代。据嘉庆八年(1803年)《临淄谭家庙村马氏先茔墓碑》记载:“吾郡属邑缙城西有马氏茔,岿然双对,盖二命妇冢也。稽其家乘,考之元史,马氏先人为大勋戚,秉钧当轴,服官四方者世不乏人,以功世袭铁木耳职。当元顺帝北逊,马氏先人扈蹕乘舆,以身当敌,帝乃得行。”<sup>⑯</sup>另有沙氏家族亦将祖先追述至元代,据《金岭镇沙氏四世祖岗公墓碑》记载:“沙氏自元世祖入中华”<sup>⑰</sup>(P458)。目前,青州脱氏以今河北邢台新河脱氏为同宗,而新河脱氏又以元代脱脱为其祖源,“始祖脱翁讳周彬,隐居于新邑之东南董村,距县十五里许,实系元朝脱脱丞相之裔也”<sup>⑱</sup>。不过,至迟在民国时期,脱氏对其祖源另有传说,“吾青州城里脱姓,原自甘肃兰州定阳县脱家沟迁来,任阿匐而落户焉”<sup>⑲</sup>(P351)。

从青州回回人家谱记录来看,有相当一部分回回家族对祖先移民故事的追忆在清代逐渐趋同于“出于回部”的统一表述。“出于回部”的祖先故事成为本地回回人较为一致的一种祖先记忆。在“出于回部”这个松散的祖先故事框架中存在着多个子版本的故事,其中杨、赵两氏都将祖先追述到元代的赛典赤·赡思丁;赵、丁两氏都将血缘与穆罕默德挂钩;其他如马、沙等氏亦认为自己的祖先出于元代。这些子故事共同构成了青州当地回回人对祖先身份和移民过程较为普遍的历史记忆。

当然,“出于回部”祖先记忆并不能涵盖所有青州回回家族的发展历程,但是这种极具影响力和结构性的历史记忆框定了青州回回人对自身历史的描述方式。杨峒在为刘氏家谱所作的另一篇序言中说:

明洪武初,山东氏族之出于金元者,皆以近似改为汉姓,而后世子孙或舍其本以自附于中原之旧姓氏,紊有自来矣。回纥者,元色目三十一部之一也。自元太祖定西域,从而内徙者甚众,降及胜朝,所在



散处者谨守其俗,不肯有所攀援,故其谱独为可信。兹者刘氏华谱,前明有讳铭者,自沧州徙家于青,子瓚字廷璧举成化元年乡试,二年成进士,累官陕西按察使司副使。青之庶族出回部者推为著姓<sup>⑤</sup>。

在杨峒眼里,元代回回人与金元以来其他民族人士不同,一直保持自己的习俗和文化传统,青州刘氏即为一例。杨峒将刘氏划为出自“回部”的家族。但是,如果我们考察沧州刘氏家谱资料后,就会发现青州刘氏在沧州的同族后裔并不认为自己“出于回部”,或者说并不追忆自己祖先的“回部”特色。“出于回部”的历史记忆为青州回回人所特有<sup>⑥</sup>。

### 回汉互动中的“回部人”

清代青州回回人用“出于回部”概括自己的族源和族属,本地汉人也用“回部”这个词表达他们对本地回回人群体的认识。

咸丰《青州府志》收录杨峒先人杨鸾、杨应奎、杨珽以及马之骥等人的事迹,并没有标明他们的族属,但在述及杨峒时特别指出他为“益都回籍人”。杨峒作为青州有名的儒士,他与汉族上流人群的交往、对地方事务的参与都彰显了其士绅的身份和地位,在这一点上他的族属并没有成为他踏入汉人主流社会的障碍。相反,他作为一个“回籍人”的特征并不明显。该志在杨峒传记中特别提到了他的丧葬“用儒礼”,也就是说他没有按照穆斯林的丧葬礼仪从事,而是用汉人的习俗下葬,这种行为在一般意义上即可以认为是脱离了伊斯兰教的宗教信仰。我们从其他材料中看不出他的家人、亲属以及同邑的回民对这种行为作何评价。事实上,杨氏家族用儒礼安葬的人不止杨峒一个,他的哥哥杨盼“置棺木漆之以待,衣服北距,八十二终,比葬遵礼经,不用旧习”;杨盼之子杨绍基也“遗命以棺衾葬”。尽管志书的编纂者对杨峒变俗的举动略有赞赏之意,但这似乎仍不能改变其对杨峒族属的认定“学者尤称之回回人”<sup>⑦</sup>。在这个时候,穆斯林习俗的变与不变都已经无法停止人们对其回部人身份的识别。看来当时的社会上在汉人与回回人中间,确实存在着一个“你”与“我”的区别“回籍人”或“回部人”不是“汉人”,也变不成“汉人”。到光绪年编修《益都县图志》时,汉人对回回人族属的认定变得更为明确。仍以杨氏为例,该书对杨应奎“其先回部人”的表述几乎涵盖了该志中出现的所有杨姓后人的族属。尽管对他们的信仰和生活习惯只字未提,但对其非汉人的身份认识得很清楚。

在青州现存的各种版本地方志中,《益都县图志》是个非常特殊的文本。主纂者法伟堂字容叔,号小山、筱山,胶州法家庄人,光绪五年(1879)贡生。法伟堂在青州主讲“旌贤书院”时应知县张承燮之请主纂《益都县图志》。张承燮离任后,“后来者多不久其任,故未暇措心于其间。而小山先生则任事锐甚,旁搜远绍,未尝作辍,历十余年如一日也。”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李祖年“由泰安移宰来此,与小山先生朝夕过从,见所辑图志,哀然成帙,喜观厥成,欲速付剞劂,而先生尚以未嫌为辞”<sup>⑧</sup>。到光绪三十年(1904年),法伟堂应聘到济南师范教习所任所长,临行前将几近完成的文稿转交给李祖年,李祖年请孙文楷校补刊行。《益都县图志》始修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成书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历时17年,由前后两任知县张承燮、李祖年主修,法伟堂总纂,孙文楷校补,参与采访和誉录的有百余人,参与者中不乏青州当地回民,如举人丁渥恩、拔贡丁培基、附生马建名等人。

《益都县图志》的特殊之处在于其中收录了大量有关青州回民的信息,包括他们的家世、功名、官职、行迹、著述等方方面面。更有意思的是《图志》里非常明确地标识出这些人的族属,即所谓“回部人”。除了对杨应奎族属的记载外,还有如“赵步云,字天衢,其先西域回部人”;“杨献恒,字龙泉,回部人”;“王作楫,字相廷,金岭镇回部人”;“丁瓚,回部人”;“丁成明,字亮斋,东关回部人”;“张砮,回部人”<sup>⑨</sup>等。《益都县图志》人物传记的资料来源除了家谱、行状等文献资料外,出自杨氏家族的杨滇所撰《邑先辈纪略》为《图志》的编纂提供了大量人物传记信息。朱廷基、高连峻、丁殿祥、王燧、赵步云、杨峒、曹大观、蒋天枢、王承基、李容、丁瓚等十余人的传记皆取自或参考了《邑先辈纪略》,其中丁殿祥、王燧、赵步云、杨峒、王承基、丁瓚等人又都是回回人。这很容易给人留下这样一个印象,益都县的回回人经由同是回回的杨滇的著述得以在县志中留名。事实上,杨滇的著述并不是专为回回作传,凡乡耆节烈均有收录,共八十余人,益都回回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此外,《邑先辈纪略》也不像《益都县图志》那样对回回的族属明确标识,《纪略》除了在张砮传记中提到张砮、查松、马士书“三人皆回部也”之外,其他回回的身份都没有明确说明。因而《益都县图志》对回回身份的关注与杨滇的族属和他的著作没有关系,它的特殊性并不是由于有回回人参加编纂工作而产生的。《图志》所强调的“回部人”身份代



表了当时的汉人对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回回人的历史与族属的认知。透过《益都县图志》这个文本,我们看到清朝中后期汉人已然将回回人看做是一个有着共同族源、发展历史和宗教信仰的群体,这是杨峒及其后人在明代的祖先不曾遇到的情况。杨峒在被汉人识别为回部人的同时,自己也使用“出于回部”来

概括自己所属的这个已经建立起共同族属、拥有共同信仰和割不断的亲属关系的群体。前文提到《益都丁氏族谱》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谱序中就明确指出“丁氏系出回部”。回部人与汉人的界限不仅在回民和汉民之间已然形成,回回人自己也产生了共同的族群归属感。

光绪《益都县图志》所载回回人统计表

| 人物      | 年代 | 出现位置                  | 人物  | 年代 | 出现位置            |
|---------|----|-----------------------|-----|----|-----------------|
| 刘 璜     | 明  | 选举志                   | 丁赞业 | 清  | 人物志·孝义传         |
| 杨应奎     | 明  | 选举志、艺文志、人物志·列传、人物志·杂志 | 刘福增 | 清  | 人物志·孝义传         |
| 杨 金     | 明  | 选举志、艺文志               | 张 砮 | 清  | 人物志·艺术传、人物志·隐逸传 |
| 杨 铭     | 明  | 选举志、艺文志               | 王承基 | 清  | 人物志·儒学传         |
| 杨如卜     | 明  | 选举志                   | 王 熾 | 清  | 选举志、艺文志、人物志·列传  |
| 杨 桐     | 明  | 选举志                   | 王 煊 | 清  | 艺文志             |
| 杨应奎祖姑姊妹 | 明  | 人物志·烈女传               | 王 灼 | 清  | 选举志             |
| 杨 氏     | 明  | 人物志·烈女传               | 丁殿祥 | 清  | 选举志、人物志·列传      |
| 马 仁     | 明  | 选举志                   | 丁殿甲 | 清  | 选举志             |
| 马 礼     | 明  | 选举志                   | 杨 峒 | 清  | 艺文志、人物志·儒学传     |
| 马之驥     | 明  | 选举志、艺文志、人物志·儒学传       | 杨绍振 | 清  | 选举志             |
| 查 瑶     | 明  | 武备志                   | 杨绍基 | 清  | 选举志、艺文志、人物志·列传  |
| 查世显     | 明  | 武备志                   | 杨承基 | 清  | 选举志             |
| 查 雄     | 明  | 武备志                   | 杨 浪 | 清  | 艺文志             |
| 查可胤     | 明  | 武备志                   | 丁渥恩 | 清  | 选举志、艺文志         |
| 查懋中     | 明  | 武备志                   | 沙 钊 | 清  | 选举志             |
| 查续成     | 清  | 人物志·杂志                | 赵登云 | 清  | 选举志、人物志·隐逸传     |
| 杨 珽     | 清  | 人物志·儒学传               | 丁保清 | 清  | 选举志             |
| 杨延嗣     | 清  | 艺文志                   | 丁鸿葵 | 清  | 选举志             |
| 赵步云     | 清  | 人物志·列传                | 马本固 | 清  | 人物志·忠烈传         |
| 杨献恒     | 清  | 人物志·孝义传               | 马印麟 | 清  | 艺文志             |
| 王作楫     | 清  | 人物志·孝义传               | 马鸣显 | 清  | 人物志·隐逸传         |
| 丁 璜     | 清  | 人物志·孝义传               | 马 君 | 清  | 人物志·杂志          |
| 丁成明     | 清  | 人物志·孝义传               | 丁际隆 | 清  | 选举志、艺文志         |
| 杨至亮     | 清  | 人物志·孝义传               |     |    |                 |

资料来源：光绪《益都县图志》。  
注：另有尚未辨明族属的人员若干，留待日后进一步考证。

历史记忆与族群的形成

青州回回人对其祖先来源的历史记忆经历了明清两代的变化，明代“都人南迁”的表述更为靠近元明鼎革之际回回人的真实生活境遇。进入明朝之后，青州地区回回人出身的进士、举人以及官员在地方社会中活动很容易引起我们的注意，杨应奎、马

仁、马礼、马之驥均入祭青州府乡贤祠，马仁又入祭益都县乡贤祠，这些都可视为是当地社会给予他们的评价。不过，在雍正朝以前的青州方志中，均不见对被收入其中的回回人后裔族属有任何记载，同时代与其交游的文人文集中也不强调他们的域外身世和“非我族类”的观念。安致远<sup>⑧</sup>、张贞等人多引用杨氏家谱的记载追述杨氏后人的身世，如张贞在《益



都杨君搢珽墓志并铭》中说：“搢珽讳珽，始祖赛典赤，至自默德那国，为元佐命，居宛平，累世皆袭王爵”<sup>②</sup>。这段话显然是出自杨氏后人对自己祖先的追忆文本。安致远、张贞等人对杨氏家族的态度说明从明朝直至清前期，北方的汉人对于这些居于北方腹地的回回人后裔并未产生族群归属上的“我族”与“你族”的区分。尽管在现在看来，刘瓚、杨应奎、马仁、马礼、马之骥等人可能具有共同域外祖先或宗教信仰，但对生活在明代青州的他们来说，“回回”的身份并未被其生活的环境所刻意识别。当然，地方志、文集等文献中不强调“回回”的身份，并不意味着这些回回人后裔在当时已经磨灭了自己的宗教特征和生活习俗，变得与汉人无异。从清真寺现存碑记看，青州在明代出现的几位回回名人都参与过清真寺的修建活动。

青州府正南隅有古刹，清真回回礼拜寺，自大元大德陆年元相伯颜后裔所立。自大明洪武定鼎，荒废迤散，止存不过三五家承理。有明成化丙戌科进士刘瓚，官至陕西按察司副使，分守汉中兵备道重建。又有正德辛未科进士杨应奎，官至河南南阳府知府重建。东门内迤南礼拜寺，系明宁阳王载堉所立，有天启乙丑科进士马之骥，官至国子监司业重建<sup>③</sup>。

本地颇有成就的回回人士刘瓚、杨应奎、马之骥等人都出现在修寺名单上。如果说修建清真寺只能从侧面表明这些人的信仰，那么来自他们本人对自己信仰的描述，则直接说明了他们在明代的信仰状况。以刘瓚为例，明弘治六年（1493年）济南府历城县礼拜寺重修告竣，有唐世杰者到青州请刘瓚撰写碑文。刘瓚在这块名为《济南府礼拜寺重修记》的碑中说：“予忝教末，及世杰请之甚坚，欲辞焉，意不可却矣。”<sup>④</sup>刘瓚自称“教末”，直接点明了自己的穆斯林身份。此外，从碑文的内容也可以看出撰文者对伊斯兰教信仰、教义和各种仪式的熟识，表明该碑出自一位教中人之手。

唐初开元年，有圣人者出，代天传道。始于西域，渐入中华，天下率由者众，其道故多端矣，而其教人之要则有成焉，所谓诚、礼、斋、济、游是已。诚者，物之始终，君子诚之为贵；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斋者，斋戒沐浴，迁善改过；济者，补其不足，助其不给；又有游焉，游诸西域，以格享上天。今寺制既具，固不偶然，抑岂无益之举哉？讲习讨论，示人以知此者，在是；省察克治，示人以体此者，在是；仰拜造化万物者，在是；颂祷天子万寿者，在是；称原宗

社人民安固如泰山者，亦在是<sup>⑤</sup>。

刘瓚所说的诚、礼、斋、济、游，即指伊斯兰教的五功：念、礼、斋、课、朝，是伊斯兰教要求每一个信教者必须履行的功修。刘瓚从一个受过儒学熏陶的士大夫的角度理解了五功的内涵和清真寺存在的意义，将宗教的思想和礼仪与儒学的追求结合起来，为清真寺和穆斯林的宗教活动在以儒学为主导的主流社会中存在提供了充分的理由。

借助于刘瓚自己的著述，我们得以确知他的宗教信仰，但在其他关于他的文献资料里这一点并没有被凸显出来。刘瓚的例子再一次表明，明代青州社会中，人们对像刘瓚这样有不同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的人并未产生强烈的“非我族类”的认知观念，也许在这个时候，人们更多地将他们看作是一些谨守祖先习俗的人或家族。

从清朝中期开始，青州回回人出现了祖先出于“回部”的表述，本地的汉人对当地回回人出自“回部”身份的认知也逐渐清晰。当我们把这两方面的变化对照起来的时候，总体的印象是来自国家与社会的某种变化转变了汉人对回回人的看法，同时迫使青州回民改变以往的生活方式，重新处理自身与汉人地方社会之间的关系。乾隆年间成为青州回回人社会发展历程的一个分水岭。

青州汉人和回回人对回、汉族属的识别在清中后期日益明显，“回部”一词代表了对回汉分属不同族属的认知。青州的汉人使用“回部”这个词来描述回回人的族属是在清中期特殊的国家政治环境中形成的。清代使用的“回部”一词有明确的地域和人群指向，清代称已然改信伊斯兰教的维吾尔人为“缠回”，其所聚居的天山南路通称为“回部”。明末清初，天山以南地区一直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清朝的统治者虽然重视天山南北的战略地位，但为了联合蒙古各部，藩屏北疆，清王朝更注重处理与蒙古各部的关系，而置维吾尔人于次要地位。康熙年间，北路准噶尔部南侵，开始了蒙古部族对回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统治，回部与清王朝的联系完全隔绝。随着清政府与准噶尔关系恶化，康熙和雍正逐渐改变对维吾尔族穆斯林的态度，采取“联回抗准”的策略，为平定准噶尔部创造条件。乾隆二十年（1755年），乾隆趁准部内乱之机出兵收复了天山北路。同年六月，乾隆采纳了定北将军班策的建议，让被噶尔丹羁留在伊犁的白山派首领大小和卓返回南路“招服叶尔羌、喀什噶尔人众”<sup>⑥</sup>。不过清政府招抚回部的策略并没有取得成功，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小和



卓将清朝派来招降的副都统阿敏道及其随行人员杀害,聚集2000余人的武装,建立起巴图尔汗国,与清廷对抗。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正月,清政府正式派兵征讨大小和卓,一年以后回部平定,天山南北成为清王朝的“新疆”。康雍乾三代对天山南北的经略是清朝中期稳定西北边疆、巩固西北边防的王朝大事,“回部”在三朝实录、上谕、奏章里的出现频率很高,民间对王朝北部边疆也投入了许多关注。在对西北史地和域外历史不甚明了的情况下,当时的人们很有可能将身边回回人的族属与同样信仰伊斯兰教的“回部人”联系在一起。

与大多数地方使用回回、回民等词相比较,青州的汉人和回回人都使用“回部”来描述本地穆斯林的族属,这与本地回回人关于元代遗民的祖先移民故事有密切的联系。如前文所述,青州回回人多将自己的祖先追述到某位域外人士身上,无论是穆罕默德、赛典赤·赡思丁还是脱脱,或者一些不知名讳的祖先,他们的共同之处是以域外人的身份在元朝享有高官厚禄。这些元代大勋戚的后裔大多不能准确地表述自己祖先的祖籍地,他们比较关注的是其祖先在元代的功绩和地位,至于祖先们来自何处,则语焉不详。如果考虑到赛典赤也是穆罕默德的后裔,那么对于大多数青州回回人家来说,他们对祖先祖籍地的想象可能会笼统地指向穆罕默德诞生的地方——西域天方国。“西域”这个词的内涵在清朝平定天山南北前后发生了变化,明代人将敦煌西至阿拉伯半岛等地统称西域,而清中叶在先后平定蒙古准噶尔部和天山南路大小和卓叛乱之后,“西域”这个称谓固定指清朝所属的天山南北地区。乾隆二十七年(1760年)撰修的《钦定西域图志》载称西域“东南接肃州,东北至喀尔喀,西接葱岭,北抵俄罗斯,南接番藏”<sup>[2]</sup>。此后的《大清一统志》和《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进一步详述了西域的范围:“东至喀尔喀、瀚海及甘肃省界,西至萨马尔罕及葱岭界,南至拉藏界,北至俄罗斯及左右哈萨克界,东南至甘肃省界,西南至葱岭、达喀山痕都斯坦诸属界,东北至俄罗斯界,西北至右哈萨克界。广轮二万余里,北为旧准噶尔部,南为回部统辖天山南北事务将军,驻扎伊犁,至京师一万八百二十里。”<sup>[3]</sup>从乾隆以后的上谕、奏折、志书中,我们看到“西域”经常与“新疆”一词连用,最后逐渐被“新疆”所取代。如《清高宗实录》记载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十一月“军机大臣等议覆,御史曹学闵奏称:从前纂修大清一统志,于乾隆八年告成,久已颁行海内,近年来平定准噶尔及回

部,拓地二万余里,实为振古未有之丰功。前命廷臣纂修西域图志,并令钦天监臣前往测量各部经纬度,增入舆图,惟一统志尚未议及增修,请飭儒臣,查照体例,将西域新疆敬谨增入”<sup>[4]</sup>。此后《大清一统志》将天山南北称之为“西域新疆统部”,将今中亚地区及布鲁特、哈萨克等称“新疆蕃属”。到《嘉庆重修一统志》时西域新疆统部简称新疆统部。道光初年刊行的《钦定新疆识略》只用“新疆”涵盖天山南北,认为“今之新疆即古西域”<sup>[5]</sup>。祁韵士在《西陲要略》中也明确指出新疆即古代的西域<sup>[6]</sup>。

“西域”一词在清中后期内涵的变化使人们很容易将回回人在元明时期使用的“西域”与清代的回部新疆联系起来。成书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左右的小说《野叟曝言》及其评注里便将“天方”、“西域”、“回部”等词混用。如书中称“天方在西域回部,波斯爱乌罕之西,为亚细亚之西边尽海处”,又有“回部天方信奉摩哈麦者”,可知清代中后期人有将西域、天方、回部三个概念等同使用的现象<sup>[7]</sup>。如此看来,青州人将这些同样信仰伊斯兰教的人们称为“回部人”也就不足为奇了。

青州回回历史记忆变迁的背后蕴含着本地回汉两个族群明清以来相互关系的变化以及回回族群自身团体不断强化的过程。从明初到清初,回回人群的群体特征更多地表现为血缘亲属关系和信仰关系,且外化为家族和清真寺。此时,带有族群性的区分与认同观念并不明显地存在于回回人生活的社会空间里。但是从清中期开始,平定天山南北、西北民变等历史事件突显了不同空间内共同信仰者之间存在的联系,无论是回回人自身还是王朝的统治者、共同生活的汉人,伊斯兰教的信仰使他们同时注意到了地域差别极大的回回人群潜在的一致性。青州回回历史记忆的历时性变迁向我们展现了回回人和汉人同时建构和强化回回人集体性祖先历史记忆的过程。各种事件、要素在不断地被选择、剪裁和拼贴中生成新的历史表述,并将不同家族包含其中共享这一结果。此时回回人之间的关系已经超越了血缘、家族、宗教所规定的范围,族群性在这些共同的历史记忆中显现,区分与认同的观念也在回汉两个人群中得以明确。

尽管回回族群的发展在清中期是一个全国性的过程,但区域性的历史要素是本地回回人群变化的基础。青州回回人在元明之际的遭遇和在明代业已形成的对祖先的历史记忆,直接影响了他们的清代后裔重构历史记忆的方法、途径以及故事转变的方



向。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清代各地回回人都遭遇到新疆、西北等事件,却在建构或重构自己历史记忆时产生了不同的选择。

本文的叙述截止到清中后期,但族群的历史还在延续,认同的变迁也没有停止,一切仍在动态之中,此后的清末民初和民族识别是回回族群发展的另外两个重要历史时期。此时,笔者不禁联想起本文开头介绍的赵世瑜对洪洞大槐树移民传说的研究。诚如作者所言,经过金元北方民族大融合以后的明清汉族经历了族群意识重塑的过程,但是明代以汉人为主体的民族的族群意识重塑和清代以被统治民族的重塑情况并不一样。由于回回人主要生活在以汉人为主体的社会之中,发生在他们身上的变化恰可说明这种差异。对历史上的回回人来说,他们在明朝初年感受到的危机至迟在明中期便烟消云散了;但他们在清朝感觉到的族群关系紧张却经历了

一个不断加强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清初的回回人社会基本上保持了明朝以来的发展轨迹,巨大的变化出现在清中期以后,由此给后人留下了清朝对回回的民族压迫更为深重的印象。如果我们脱离民族压迫的视野,从族群关系变动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就会发现发生在清中后期回回人身上的诸多变化折射出汉人群体在清代族群意识强化的过程。正是清代占据人数和文化优势的汉人和占据政权的满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导致汉人通过识别共同生活的异类——回回人群来明确自己的族群属性。汉人越是关注回回人的特殊性,越可凸显自我的文化特征,达到凝聚族群的效果。

清代以来,在帝国腹心地区汉、满、回三个族群的复杂关系构成了北方族群格局变化的一条线索,这也是我们研究明清以来回回人群发展历史时必须时刻注意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情境。

#### 注释:

①元朝在青州设益都路总管府。后来,又设立山东东西道宣慰司,为中书省派出机构,治所在益都。明洪武元年(1368年)设山东行省,治所在青州城,后改为山东布政使司,治所移到济南府。明改益都路为青州府,辖潍州、莒州、胶州三个州和益都、临淄、博兴、寿光、昌乐、临朐、安丘、诸城、蒙阴、沂水、日照、昌邑、高密、即墨、高苑、乐安(广饶)16个县。后将潍州、胶州、高密、昌邑、即墨划归莱州府,仍领13县1州。清初承袭明制,雍正年间,设立沂州府,析出沂水、日照、蒙阴属之,同时,析出益都县的颜神镇和孝妇、怀德两乡,成立博山县,青州府仍辖11县。

②赛典赤赡思丁(1211—1279),全名赛典赤·赡思丁·乌马儿。赛典赤意为荣耀的圣裔,即穆罕默德的后裔;赡思丁意为宗教的太阳;乌马儿意为长寿。均为阿拉伯语。别庵伯尔,波斯语,意为使者、先知,指先知穆罕默德。

③道光《益都杨氏族谱》,杨应奎《序》,明嘉靖十九年(1540年)。

④《赵氏先茔碑》万历五年(1577年),载赵潜主编《青州回族溯源》,重庆出版社,2004年,碑文拓片照片。

⑤据《赵氏家谱》记载,伯颜长子明高,授奉议大夫卫辉路同知封崇里侯,死元节;次子明方,死元节,授禄座勋府。《青郡赵氏宗谱》,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赵庆臻重修,乾隆十六年(1751年)赵银重修。

⑥《青郡赵氏宗谱》,(清)赵庆臻《圣裔赵氏家乘序》,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

⑦《圣裔赵氏碑记》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载赵潜主编《青州回族溯源》,重庆出版社,2004年,碑文拓片

照片。

⑧《重修祖茔碑记》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载赵潜主编《青州回族溯源》,重庆出版社,2004年,碑文拓片照片及碑文,第320页。

⑨道光《益都杨氏族谱》,《凡例》。

⑩关于杨、赵两氏的关系,请参见拙文《社会资源与家族化进程——以明清青州穆斯林家族为例》,《回族研究》,2010年第2期。

⑪“圣裔”即穆罕默德的后裔。

⑫《益都丁氏族谱》,民国30年(1941年),《丁氏续修族谱序》,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卷一,第1页(上)。

⑬《青州马氏家谱》,1996年,第13页。

⑭《西赵河刘氏家谱》,(清)杨峒《青州支原序》(一),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载吴丕清、马祥学主编《河北回族家谱选编》,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80页。

⑮沧州《西赵河刘氏家谱》中保存有该族在清乾隆以来多次修谱的序文及墓碑铭文,这些文字向我们讲述了刘氏祖先的另一个版本的移民故事,如“刘氏本南京应天府上元县二郎岗人也(今时制更为江宁府)。自前明始祖兄弟三人充洪武银牌先锋,多著战功,后调锦衣卫督指挥,靖难有功,明永乐二年封迁占地,遂于沧州牛进庄、西赵河、南皮县黑龙村三处,兄弟分处而居焉。”(乾隆四十八年序);“吾宗始祖明锦衣卫督指挥,公讳命兰,原籍南直隶上元县二郎岗。当明永乐元年癸未冬,诏迁南畿民以实北畿,公以官禁卫、家高资在徙中。乃以二年甲申偕两兄北迁,各占籍安居。”(光绪二十五年《刘氏始祖墓碑铭文》);“沧州刘氏本江南富室,明永乐初,诏迁南畿富民以实北畿。刘氏



一世祖命兰公以禁卫近侍饒于赏,诏夏,在西徙,乃奉母、兄自上元县二郎冈迁今河北省之沧县西赵河。”(民国22年《沧州刘氏始迁祖墓碑文》)等。可以看出,沧州西赵河刘氏并没有“出于回部”的历史记忆,而是强调自己的祖先于明初从南京二郎岗随龙保驾迁居沧州。关于沧州地区回回家族祖先移民历史记忆的研究,请参见拙作《沧州回族的祖先移民传说》,韩国《亚洲研究》,2008年11月。

⑩参见光绪《益都县图志》,《人物志》。

⑪安致远,明末清初山东寿光人,曾作《跋杨滉谷先生草书贴》,收入《纪城文稿》,杨滉谷即杨应奎。

⑫(清)张贞:《益都杨君摺珽墓志并铭》,载《渠亭山人

半部稿》初刻《渠亭文稿》,第78页(上)。

⑬《建寺碑》(本无碑名,笔者自起)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该碑现存青州东关真教寺内。

⑭《济南府礼拜寺重修记》明弘治八年(1495年),该碑现存济南南大寺内。

⑮《济南府礼拜寺重修记》明弘治八年,该碑现存济南南大寺内。

⑯《钦定西域图志》卷一,《西域全图说》,第9页(上)、第10页(下)。

⑰《清高宗实录》卷722,第17册,第2044页。

⑱参见(清)夏敬渠《野叟曝言》,奇字卷十九第一百三十八回,书字卷二十第一百四十七回。

#### 参考文献:

- [1] 王明珂. 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 [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 [2] 赵世瑜. 祖先记忆、家园象征与族群历史——山西洪洞大槐树传说解析 [A]. 赵世瑜. 小历史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 [C].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 [3] 丁慧倩. 社会资源与家族化进程——以明清青州穆斯林家族为例 [J]. 回族研究,2010(2):24—37.
- [4] 西赵河刘氏家谱 [A]. (清)杨峒. 青州支谱原序:(二) [M]. 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 吴丕清,马祥学. 河北回族家谱选编 [M].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181.
- [5] 赵滉. 青州回族溯源 [M].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4:458.
- [6] 刘侗. 辽宁回族家谱选编 [M].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

社,1992:74.

[7] 青州府志·人物传:卷四十九 [A]. 新修方志丛刊·山东方志之二 [Z]. 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8:3414.

[8] (光绪)益都县图志·序 [A]. 中国地方志集成 [Z]. 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1.

[9] (清)傅恒. 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十四 [Z]. 故宫珍本丛刊:第53册 [M]. 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262.

[10] 大清一统志:卷四百十四·西域新疆统部 [Z]. 文渊阁四库全书:483册 [Z].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574.

[11] 钦定新疆识略:卷一·新疆疆域总叙 [Z]. 故宫珍本丛刊:第53册 [Z]. 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43.

[12] (清)祁韵士. 西陲要略:卷一 [A]. 王云五. 丛书集成初编 [Z].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1.

## From Durennanqian to Chuyuhuibu: The Change of the Huihui Muslim's Historical Memory of Qingzhou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DING Hui-qian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Abstract:**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change of the Huihui Muslim's historical memory of Qingzhou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n Ming, they said their ancestors came from Beijing. In Qing, they emphasized that their ancestors came from Huibu (today's Xinjiang) a long time ago. This was obviousl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quelling Xinjiang in middle of Qing. At that time, the ethnic group of Huihui Muslim became clearly.

**Key words:** Huihui Muslim; Huibu; Historical Memory; Ethnic Groups

责任编辑:马金宝